

# 中国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融合逻辑及当代价值

吕佳艺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4日

## 摘要

本文系统探究中国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融合逻辑及当代价值。文章梳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历史演进脉络, 凝练出崇行重践、知行相资、经世致用的核心特质, 阐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多维理论内涵及其革命性哲学意义。通过对比辨析二者的差异与内在契合, 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历史观维度, 探究两大理论融合的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 剖析二者融合在培育青年主体自觉、规范科技伦理实践、推动生态治理转型、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的现实功用, 以期在建构扎根民族文化、契合时代发展的中国实践哲学体系提供有益的理论参照。

## 关键词

传统知行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融合逻辑, 当代价值

# The Integration Logic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the Marxist View of Practice

Jiayi Lyu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20, 2026; accepted: August 12, 2026; published: August 24, 2026

## Abstract

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ntegrative logic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with the Marxist concept of practice. It tra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distilling its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prioritizing action, fostering mutual reinforcement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applying learning to practical governance. Meanwhile, it elucidates the multidimensional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revolutionary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Marxist concept of practice.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ir differences and intrinsic compatibilit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xiology, and philosophy of history. On this basis, it examines the practical efficacy of this integration in cultivating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youth, regulating techno-ethical practice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Ultimately,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valu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ystem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that is deeply rooted in national culture and aligned with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Marxist View of Practice, Integration Logic, Contemporary Val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中国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对话，并非两种思想资源的简单并置，而是关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深层理论问题。传统知行观以心性为本体，将“行”主要理解为道德践履。它虽蕴含崇行重践的价值底色和知行相资的辩证理路，却囿于宗法伦理秩序，未能突破内圣外王的精英史观和道德乌托邦的空想色彩。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为哲学基石，将实践确立为人与自然，社会历史及人自身关系的现实中介，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及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贯通。二者融合的关键，不在于概念层面的比附拼接，而在于哲学范式的深层重构。在本体论上须扬弃传统知行观的先验心性论预设，将其践履精神奠基在物质生产实践之上，使天人合一从抽象命题转化为历史中的现实统一。在认识论上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引导传统的道德体认，超越德性之知的单一维度，实现科学认识与价值认识的辩证统一，同时以传统的人文关怀矫治工具理性的膨胀。在价值论与历史观上，须将传统修齐治平的精英理想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使大同愿景从道德空想升华为基于历史规律的科学理想。经由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三重变革，实现从结合到融合的范式跃迁。

## 2. 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历史演进与核心特质

### 2.1. 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历史演进

中国传统知行观并非静止的教条，而是随着历史变迁与哲学思辨的深入，经历了从朴素发轫、理论深化到务实转向的演进历程。厘清这一历史脉络，是把握其核心特质并探究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融合逻辑的前提。

#### (1) 先秦时期：知行范畴的奠基与发轫

先秦作为传统哲学的轴心时代，奠定了知行范畴的基本框架与“重行”基调。“知”“行”对举肇始

于《尚书·说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揭示了认知与实践的内在矛盾。此后，先秦诸子从不同维度拓展知行议题，孔子以“听其言而观其行”将“行”确立为验“知”之尺与最终旨归；孟子立足心性论，以“良知良能”将知行内化为道德本心的自觉与扩充；荀子则将“行”置于认识过程的顶端，视其为检验认知的唯一标准，孕育了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萌芽。此时的知行观虽多囿于道德修养与政治伦理，尚未形成严密体系，但其确立的“知行相资”与“重行务实”基因，深刻规约了后世哲学的演进理路。

### (2) 宋明理学：知行之辩的深化与分歧

伴随哲学思辨重心向内在心性与宇宙本体的转移，宋明理学将传统的知行讨论从经验层面的训诫升华为系统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思辨。程朱理学明确标举“知先行后”与“知行相须”之说，朱熹虽在价值论上始终重“行”，强调躬行践履的优先地位，但在逻辑发生学的意义上却坚守“知为先”的立场，由此在客观上造成知行内在统一的断裂，易于滋生“知而不行”之弊。王阳明正是针对这一裂隙，以“心即理”为本体论基石，力倡“知行合一”，主张知行在本体上的原初同一，并以“不行不足谓之知”为判准，纠偏程朱的割裂倾向。然而，阳明所谓“行”在很大程度上被泛化为一念发动之处的内心活动，在消解知行二元对峙的同时，亦使“行”丧失了作为客观物质活动的独立品格，从而在更高层面上以另一种方式遮蔽了知行的现实统一。这一时期的知行之辩，折射出理学内部理论逻辑的路径分歧。

### (3) 明清之际：重行思潮的转向与启蒙

明末清初，面对鼎革之变的历史悲剧，启蒙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展开猛烈批判，促使知行观从“心性之学”向“经世致用”与“客观实行”发生历史性转向。王夫之作为此时期的集大成者，在清算程朱“离行以为知”与陆王“销行以归知”的基础上，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sup>[1]</sup>的命题，确立了“行”作为认识基础与检验标准的首要地位，将“行”的意涵从道德内省拓展至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同时，顾炎武以“明道救世”为旨归，黄宗羲以“工夫所至，即其本体”<sup>[2]</sup>为圭臬，致力于将学问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与制度变革。明清之际的知行观打破了传统心性之学的窠臼，赋予“行”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完成了向客观实践维度的务实转向。

## 2.2. 传统知行观的核心特质

纵观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知行观虽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各异的理论学说，但其思想内核中蕴含着若干一以贯之的深层特质。

崇行重践的价值底色。“重行”是贯穿传统知行观的逻辑主线。自先秦至明清，从“敏于事”“知之不若行之”到“行可兼知”及“习行”思潮，历代哲人多将“行”视为知的归宿与确证标准。尽管传统语境下的“行”早期多局限于道德践履，但随着历史演进，其内涵已逐渐向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延展。这种凸显实践优先性的取向，不仅塑造了中国思想史黜虚务实的精神品格，也为后世接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供了本土文化土壤。

知行相资的辩证理路。中国传统哲学反对知行割裂，强调二者的相互交融与转化。无论是“知行相须”还是“知行相资以为用”，都体现出在动态生命体验与历史进程中把握知行统一的思维倾向。相较于西方古典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这种整体性的朴素辩证思维有效避免了机械的认识论。更重要的是，这种传统的辩证思维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经世致用的现实旨归。传统知行观绝非脱离现实的纯粹思辨，而是深度嵌入社会治理与人生实践之中。“修齐治平”与“内圣外王”的理念，要求将理论认知转化为经邦济世的实际行动，彰显出强烈的入世品格与现实关怀。这种蕴含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旨归，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命高度契合。然而，受制于传统宗法伦理秩序，传统知行观的实践指向始终未能突破君臣伦理与道德政治框架。这一历史局限性，恰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介入、批判与超越留下了理论空间。

### 3.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内涵及其革命性意义

#### 3.1.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内涵

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践是人与自然分化与统一的现实中介。自然界构成人类生存的客观前提，但人并非被动受制于自然，而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进行物质变换，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在这一对象化活动中，人将内在尺度运用于客观世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身体”。同时，这种改造活动始终受制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借此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与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科学界定了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

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 p. 501) 物质生产实践构成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着社会的政治与精神结构。社会历史并非某种超越力量的自我演进，而是现实的人通过物质生产与社会变革等实践活动创造的。人们在实践中结成的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同时，既定的历史条件制约着现实的实践，而实践又不断突破既有条件的限制，从而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人自身的关系。实践不仅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更是人确证自身本质力量、实现自我发展的根本途径。人的主体性、认知能力与综合素质并非先验赋予，而是在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中历史地生成的。通过实践，人不仅改变了外部环境，也改变了自身的内在自然，不断克服生物本能的局限与既有认知的狭隘。在这一过程中，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推动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最终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现实基础。

#### 3.2.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革命性意义

##### (1) 实践观引发了哲学世界观的深层重构

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往往在自然观上坚持唯物，却在历史观上滑向唯心，而唯心主义虽然抽象地发展了主体的能动性，却脱离了现实基础。马克思将“现实的感性活动”作为哲学基石，让客观实在性与主体能动性在实践基础上真正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实践观进一步揭示了物质生产劳动对社会历史的决定性作用。这不仅填补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理论空白，更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贯通起来，从根本上克服了自然与历史相割裂的二元对立，构建起严密科学的世界观体系。

##### (2) 实践观推动了哲学功能的根本性转换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 p. 502) 这句论断宣告了旧哲学沉迷于概念思辨和纯粹理论建构的终结。引入实践观点后，哲学被赋予了强烈的批判与革命色彩。它不再是书斋里静观世界的抽象思辨，而是化作无产阶级及广大群众改造客观现实的思想武器。在这里，哲学超越了单纯认识世界的工具属性，直接介入社会变革与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达成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内在契合。

##### (3) 实践观重塑了真理的生成逻辑与哲学体系的开放品格

传统哲学往往将真理理解为超历史的绝对存在，力求在纯粹思维中穷尽对世界本质的把握。马克思则实现了根本性转换，将植根于感性世界的历史性实践引入认识论基础，指出任何理论形态均系特定社会实践条件下的产物。真理不再被预设静态“实体”，而被把握为在实践中持续生成、接受检验并不断修正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拒绝被固化为僵硬的现成公式，主张在实践演进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正是基于实践观点的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内在的方法论批判机能，获得了持续的学术生命力与回应现实问题的理论活力。



## 4.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融合逻辑及实现路径

### 4.1. 差异性辨析：融合何以必要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虽在探求真理与改造世界上具有精神共鸣，但二者毕竟孕育于迥异的历史时空与文化土壤，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的理论特质与思想印记。正视并厘清这种异质性，是推进两者深度融合不可逾越的逻辑起点。辨析二者的差异，绝非为了论证两者的对立与排斥，而是为了在“求同”之前先“明异”，避免理论融合陷入生搬硬套的“物理拼接”。只有深刻把握二者在底层逻辑上的根本分野，才能找准双向互动的痛点与难点，进而为两者的深度融合与优势互补提供精准的靶向指引。

#### (1) 生成背景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生成于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其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及近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深刻变革。它是对西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与超越，具有强烈的时代批判性、革命性与科学性。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知行观生成于中国古代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背景之下。它主要围绕先秦诸子、汉唐经学及宋明理学等哲学流派展开，其生成动力源于封建社会的伦理秩序建构、国家治理需求以及士大夫阶层的道德修养诉求。它深深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宗法血缘文化之中，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历史延续性与本土文化特质。

#### (2) 作用对象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它聚焦于物质生产、社会政治和科学文化实践，关注的是主体如何运用物质力量去改变客体。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凸显了实践的物质性与客观改造功能。反观中国传统知行观，其作用对象则更多指向主观世界与伦理关系。尽管传统哲学也包含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但其核心始终在于“心性”修养与道德践履。传统语境下的“行”，多被界定为道德行为、伦理实践和政治教化，强调向内探求、克己复礼，侧重于提升主体的精神境界、澄明心性，以及维系人际伦理关系的和谐。

#### (3) 目标指向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它致力于消灭剥削与压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历史形态的更替。藉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宏阔视野，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为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由此赋予其实践观以鲜明的社会革命性与人类解放性。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终极目标则是塑造“圣人”、“君子”等理想人格，实现“内圣外王”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在个体层面，追求道德的圆满与心性的至善，在社会层面，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愿景和伦理秩序的稳定。这一目标带有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侧重于个体道德完善与社会伦理秩序的维系，缺乏对改变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系统性诉求。

### 4.2. 契合性分析：融合何以可能

理论分野并不意味着二者相互隔绝，恰恰相反，二者在实践价值立场、治学务实精神、社会理想追求层面形成了深刻的精神共鸣。这种本土文化与外来科学理论的内在相通，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能够与传统知行观双向融合、落地中国的文化根基。

#### (1) 价值理性的内在契合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绝非价值中立的纯粹工具理性，其底色是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崇高伦理；而中国传统知行观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强调“内圣外王”与“修齐治平”。两者的融合，关键在于它们都赋予了“行”以深厚的价值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道德与中国传统的“仁爱”“民本”以

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在价值指向上产生了强烈的共振。在此意义上，“实践”不再仅仅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更成为主体进行道德确证、实现人格完善与社会责任担当的伦理过程。传统知行观中的“知”往往侧重于道德良知，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则强调阶级解放，两者的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性与中国传统士人的道德自觉性得以无缝对接，为理论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伦理基础。

## (2) 聚焦具体的现实境遇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优秀哲学，都坚决拒斥脱离实际的抽象玄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认为任何实践都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生产关系，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反对空谈心性、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高度契合。两者的交融，使“知行合一”摆脱了传统心性修养往往局限于内在道德体验的局限，将目光投向具体的现实国情与时代境遇。这种对现实境遇的共同关注，要求理论必须扎根于中国具体的现实土壤之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中彰显真理力量，促使传统知行观实现了向现代实践理性的实质性转化。

## (3) 终极理想的远景同构

在终极社会理想的建构上，两者展现出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最终指向是消灭剥削与压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中国传统知行观所依托的最高社会政治理想，则是《礼记》中所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sup>[4]</sup>的大同世界。这种终极愿景的内在契合，使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能够迅速唤醒深植于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大同情结。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实践目标被赋予了“大同”的文化意蕴，而传统的“大同”理想，则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从道德乌托邦升华为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历史必然。两者共同构筑了激励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实践去改造世界、实现美好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宏伟愿景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历史行动。

## 4.3. 融合的实现路径：何以贯通

中国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度融通，并非两种文化元素的简单相加，而是立足于时代实践基础上的哲学范式重构。这种“贯通”要求我们超越概念层面，深入本体论、认识论以及历史观的内在机理，探寻二者从“结合”走向“融合”的现实路径。

### (1) 本体论向度：从“心性本体”到“物质实践”的唯物论奠基

传统知行观的本体论预设，多将“天理”或“本心”视为宇宙的终极实在。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其所谓的“行”本质上是一种“复性”或“致良知”的内在超越过程，侧重于主体的道德涵养与伦理践履。这种以“心性”为本体的知行观，虽然在强调道德主体性方面具有独特价值，但由于脱离了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其“行”往往缺乏对客观世界的实际改造能力，容易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或抽象的道德主义。与之相对，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将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确立为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前提，从而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根基。二者的融合关键在于扬弃传统知行观的先验心性论预设，将其注重“践履”的务实精神建立在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这要求将传统的“道德实践”纳入并奠基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实践”之中。通过物质实践这一现实中介，传统哲学中抽象的“天人合一”转化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统一。在此过程中，主体的道德修养不再是脱离现实的内在反省，而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得到提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不再是纯粹的物质运动，而是包含主体目的与价值追求的感性活动。由此，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实现了主观与客观、内在道德完善与外在世界改造的辩证统一。

### (2) 认识论向度：从“道德体认”到“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辩证发展

在认识论层面，传统知行观的“知”多指向张载所言的“德性之知”，侧重于伦理直觉、道德良知与

人生智慧的体认，而对“见闻之知”往往采取轻视或排斥的态度。“行”则主要被视为道德意志的落实与伦理规范的践履。这种认识模式虽然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科学理性的缺失。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其“知”旨在揭示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其“行”是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标准。超越“道德之知”的单一维度，实现认识论的现代转换，是二者在认识论层面融合的关键。这一路径要求实现科学认识与价值认识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引导传统的道德体认，使“知”从抽象的伦理教条转化为对自然与社会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赋予传统知行观以现代科学精神。另一方面，需将传统知行观中的人文关怀与价值追求融入科学认识之中，以防止工具理性膨胀和技术异化。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知”与“行”不再是静态的本体同一或简单的先后关系，而是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在具体历史实践中的内在统一。这种融合使认识过程不仅是探索客观规律的过程，也是实现人类价值目标的过程，最终实现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

### (3) 价值论与历史观向度：从“内圣外王”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观超越

任何哲学理论的最终落脚点都在于其价值追求与历史观。传统知行观的最高理想是“成圣成贤”与“修齐治平”，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秩序。然而，这种“内圣外王”的理念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其实践主体往往局限于少数士大夫阶层。同时，由于缺乏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这种“大同”理想往往带有空想色彩。与之相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确立了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最终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二者在价值论与历史观层面的融合是实现从“精英史观”向“群众史观”的转变，以及从传统社会理想到科学共产主义的超越。这要求对传统知行观的实践主体进行拓展，将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5]的社会责任感，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确立人民群众为“知行合一”的真正历史主体。在价值追求上，需要将个体“内圣”的道德完善与“外王”的政治诉求，转化为变革现实生产关系、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社会实践。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与精神条件。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中获得了现实基础，实现了传统社会理想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具体统一。

## 5.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融合的当代价值

### 5.1. 涵育青年知行合一的主体自觉

在社会转型与数字媒介交织的时代语境下，青年群体中认识与实践相背离的“知行脱节”问题日益凸显，其实质是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断裂。在数字媒介构筑的符号化生存境遇中，部分青年呈现出“认知表象化”与“实践弱化”的悖论。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与竞争压力，易陷入实践退缩或盲目竞争等行为偏差，折射出主体性的消解与对象化活动的异化，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育难以有效转化为青年的内在认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真理的确证必须诉诸主体的感性物质活动。中国传统哲学所倡导的“事上磨炼”[6]，经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唯物主义扬弃，与“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具有深刻的内在契合。青年唯有投身于基层调研、志愿服务等具体的对象性活动中，才能使抽象的理论认知与客观现实发生真实的交互。在分析和解决现实矛盾的过程中，青年得以将外在理论内化为价值认同，并外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而实现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辩证统一，弥合认识与实践的鸿沟。归根结底，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实践中，青年才能深刻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将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融入社会历史进程，在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 5.2. 确立科技向善的伦理实践范式

当前科技伦理治理的困境表征为工具理性僭越与价值理性式微，究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对技术理性的结构性裹挟。传统伦理囿于“技术中立”的意识形态幻象，陷入事后追惩的被动监管窠臼。然而，技术绝非价值无涉的纯粹工具，而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对象化与物化，算法架构实质是资本权力与价值偏好的代码化沉淀。对传统“道器不割”[7]智慧进行唯物史观转化，即“器”必承载“道”。因此，伦理规约须超越事后补救，前置于技术生成源头，实现价值理性的架构性嵌入。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伦理建构须直面科研主体在资本增殖逻辑下的“知行背离”。科技工作者应将伦理底线内化为抵抗技术异化的实践定力，在资本张力中弥合认知与研发的断裂，重塑科技向善的主体性。此外，技术快速迭代与静态审查的时空错位易致规制震荡。辩证认识论强调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要求摒弃静态评估，确立技术演进历史性与伦理规约具体性相统一的动态审查机制。以真实应用场景为检验伦理真理性的“试金石”，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循环中动态校准边界。由此，科技伦理将从外在刚性他律升华为内生自觉自律，最终在物质实践中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类解放的价值同构。

## 5.3. 推进绿色发展的生态治理转型

绿色发展转型背景下，宏观生态治理举措向生产生活场景落地转化仍存在衔接难题。部分地区推进减碳易简化为行政指令与运动式治理，公众环保意识虽提升，却尚未完全转化为绿色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常常将人与自然视为外在对立，将生态保护片面理解为对经济发展的外部限制。中国传统“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智慧启示我们，人与自然的联系并非抽象理念，而是根植于日常生产生活的现实联结。马克思指出，人类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持续的物质代谢，而生态危机的实质，正是资本无限扩张逻辑导致了这一物质变换过程的断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启示我们，当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理念落实到具体体制机制时，生态保护就能从外部政策约束转化为经济系统内生动力，从而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统一。针对公众环保意识与消费行为脱节问题，中国传统“节用有度”[8]思想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结合，把宏观“双碳”目标转化为公众日常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促使绿色生活从外在道德倡导内化为稳定生活习惯。这不仅是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有效途径，更为迈向人与自然真正统一的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 5.4. 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知行转化

各项治理政策逐级落实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认知理解上的错位现象。部分基层干部对政策精神的理解若停留于文本表面，将传达等同于单向灌输，易缺乏化解具体矛盾的能力，忽视社会治理是主体与群众双向互动的过程。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提升治理效能，关键在于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实践自觉。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在于打通政策制定与执行环节，推动基层干部从被动的“政策执行者”转变为主动的“问题解决者”。应依托基层协商民主平台与民意反馈机制，使政策在执行中接受实践检验，并根据群众的真实反馈进行动态调整，实现从“文件治理”向“实践治理”的转变。在基层治理中贯彻传统民本思想，将“爱民亲民”理念转化为深入群众、倾听诉求的行动自觉，使治理不再是冷冰冰的行政流程，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群众工作。注重“知行转化”的治理思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立场，汲取传统政治哲学“为政以德”的历史智慧，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兼具科学性与人民性的实践路径。

## 参考文献

- [1] 宋志明. 天下惟器——王夫之哲学话题刍议[J]. 船山学刊, 2011(4): 5-10.



- 
- [2]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 第 10 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戴圣. 礼记[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5] 周刘波. 家国情怀: 历史教育的价值旨归及其实现路径[J]. 教学与管理, 2017(28): 70-72.
  - [6] 王嘉毅, 鲁子箫. 规避伦理风险: 智能时代教育回归原点的中国智慧[J]. 教育研究, 2020, 41(2): 47-60.
  - [7] 吴晓明. 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4: 162-175.
  - [8] 吕忠梅, 田时雨. 论具有中国特色环境法典的编纂[J]. 中国法律评论, 2022(2): 1-16.